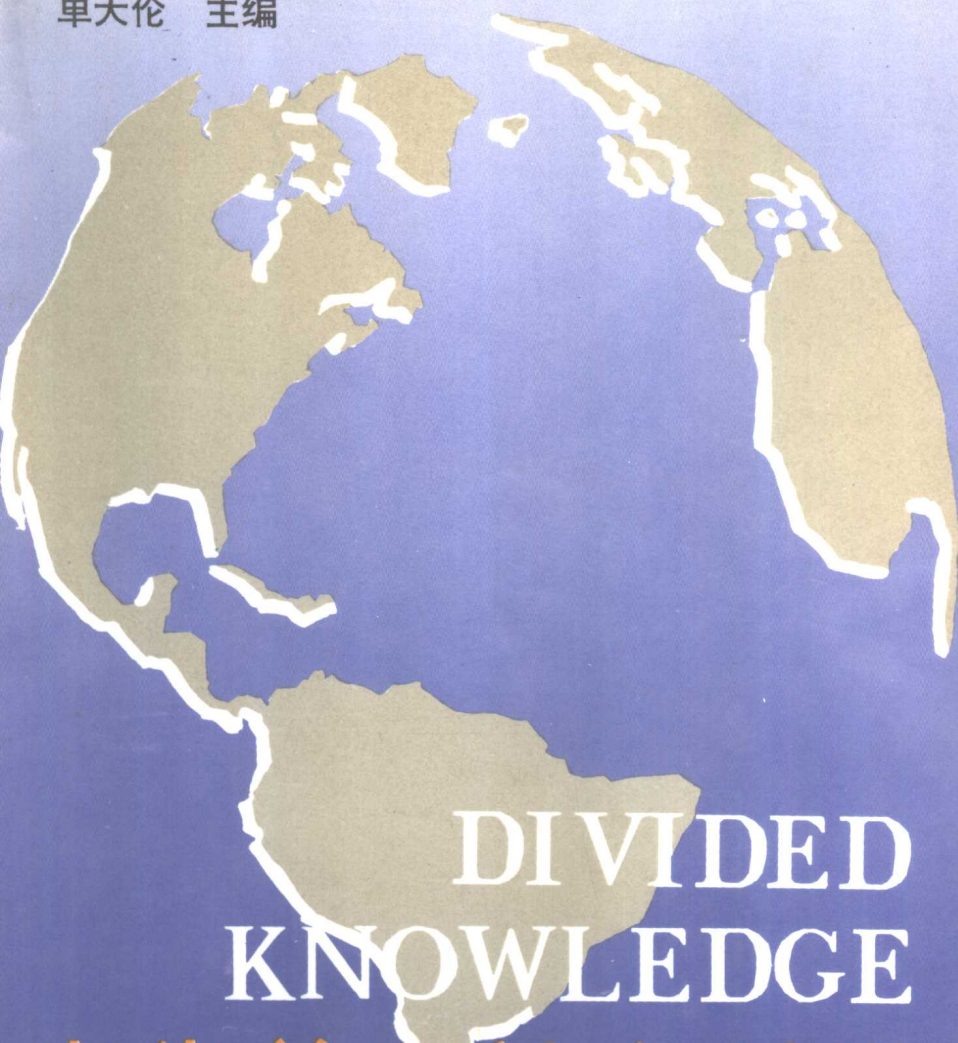


单天伦 主编



DIVIDED
KNOWLEDGE

当代美国社会科学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当代美国社会科学

单天伦 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京)新登字 028 号

当代美国社会科学

单天伦 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 5 号 邮政编码: 100732

新华书店经销 管庄印刷厂印刷

850 × 1168 1/32 开本 7 印张 172 千字

1993 年 10 月第一版 1993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00001 - 2500 册

ISBN 7 - 80050 - 401 - 8/C · 39 定价: 8.7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和美国文理科学院 北京学术讨论会上的致词(代序)

丁 伟 志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与美国文理科学院北京学术讨论会开始的时候，我以十分愉快的心情，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胡绳院长，向为了发展中美学术交流，不辞辛劳，远涉重洋而来的戴维·伊斯顿教授和各位美国学者，表示热烈的欢迎。

我要特别感谢伊斯顿教授对中美学术交流所怀有的热情和富有成效的工作。1984年经过友好的商谈，签订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与美国文理科学院学术交流备忘录，由于经费等方面的原因，这项计划没有能够立即执行。现在在伊斯顿教授和王焕宇教授的共同努力和合作下，我们两院的第一次学术讨论会，今天终于顺利举行了。这是我们两院学术交流活动进一步发展的良好开端。大家知道，中国社会科学院与美国学术交流近十年来有了较大的发展，现在又开辟了一条新渠道，这自然是令人高兴的。但是，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我院经费状况的改善，我们对外学术交流将会不断发展，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国际间学术交流的前景是宽广的，令人鼓舞的。

我深信这次学术会议必定能够取得良好的结果。这是一次多学科、规模较大的学术讨论会。美国文理科学院的出席学者，都是美国学术界有影响、有声望的著名学者，这次为我们提供了八篇很有意思的论文，中国的与会学者已经认真阅读了。可以相信，这次讨论会一定会是热烈的。通过这次学术交流，中国学术

界对美国这几门学科的研究状况，肯定会有进一步地了解，中美双方学者也一定会增进友谊。

科学应该促进人们互相了解，应该有益于人类社会的进步，它不应该受地域和国界的限制。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审视历史，审视中国，审视世界。他们乐意接受一切新知识，并且愿意以自己的才智和科学研究的成果，为维护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服务。发展国际间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将是我院长期的方针。在座的有美国驻华使馆的文化参赞罗明昆先生，福特基金会驻京办事处主任盖思南先生，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朱小康先生，还有新闻界的许多朋友们，在我们实行这一发展国际间学术交流方针的过程中，如果能得到你们在不同方面惠予帮助和支持，我们将十分高兴和感谢。

我对我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和繁荣充满信心，对中国社会科学院与世界各国、包括美国学术交流的发展充满信心。

前 言

这本论文集，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和美国文理科学院北京学术讨论会上美国学者提交大会的论文汇编。会后，美国学者又都作了些修改。同样的论文已在美国用英文文集出版。

文集收录的八篇论文，分属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八个学科，分别介绍了美国的哲学、历史学、文学、政治学、社会学五个学科及公共政策和管理、商业管理、区域研究三个交叉学科的发展历史、现状和发展前景，特别着重介绍了这些学科近年来讨论的重大问题及其代表性观点。作者的初衷是想让中国学者对美国这些学科的概貌、发展趋势和当前讨论的热点问题，有个尽可能全面的准确的了解。虽然祇是八个学科，但是这些学科是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一些很重要的学科，所以我们将这本论文集定名为《当代美国社会科学》。论文的作者都是美国有关学科的著名学者。我们将这些论文集出版，提供给中国学术界，旨在让更多的中国学者对美国上述诸学科能有进一步的了解。当然不是表示我们赞成文章中的所有观点。这一点我想读者是不会产生歧义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和美国文理科学院北京学术讨论会，是根据两院共同签署的学术交流“谅解备忘录”举行的。1983年，应中国社会科学院邀请，美国文理科学院副院长戴维·伊斯顿（David Easton）教授访问我国，在有关研究机构和一些大学讲学。访问期间，他向当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马洪教授和副院长汝信教授建议建立中国社会科学院和美国文理科学院之间连续性的学术交流计划。马洪院长和汝信副院长赞赏戴维·伊斯顿教

授对开展两院学术交流的良好愿望和建设性的意见。1984年9月,由哈曼·费西巴哈(Heyman Feshbach)教授为团长,由戴维·伊斯顿教授、菲利浦·库恩(Philip·Kuhn)教授和美国文理科学院执行副主席柯瑞·希琳(Corinne ScheLling)女士组成的代表团访问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汝信副院长等进行了友好的会谈,签署了两院学术交流“谅解备忘录”。由于需要进行准备工作和筹集经费,“谅解备忘录”关于学术交流活动计划,直到1988年才正式付诸实施。1988年5月北京学术讨论会,是两院实现学术交流“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次学术交流活动。根据双方协商的一致意见,北京学术讨论会由美国学者提供论文,中国学者对其进行评论,提出问题,共同讨论。与会的中美两国100多位学者,一致认为这次学术讨论会开得很成功。

根据双方的协议,原计划采取同样的方式,于1989年或1990年,美国文理科学院作东道主,在美国举行第二次学术讨论会,选择美国学者感兴趣的中国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若干学科,由中国学者提供论文,美国学者对其进行评论,提出问题,共同讨论。但是,并非由于我方的原因,这个计划至今没有能够实现。关心两国学术交流的中美学者,对此不无遗憾。

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包含广阔的领域,并且在日新月异地发展,中国和美国的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具有各自的特点和优势。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进行学术交流,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增进了解,增进学者之间的友谊,促进科学事业的繁荣和发展,为本国的建设和世界和平与发展服务,是我们的根本方针。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为开放型的学术研究机构,随着国家改革开放形势的发展,将不断加强和扩大对外学术交流和合作。

本书在出版前由曹德歆根据作者的修改稿统一进行了校译。

单天伦

1992年12月

目 录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和美国文理科学院

北京学术讨论会上的致词(代序)	丁伟志 (1)
前言	单天伦 (1)
美国的政治学: 过去和现在	戴维·伊斯顿 (1)
寻求认同的美国社会学	拉尔夫·H·特纳 (23)
历史学家在怎样做(和做什么)?	查尔斯·蒂利 (50)
在美国文学研究发展中理论的作用 ...	J·希利斯·米勒 (85)
美国当代哲学	约翰·R·塞尔 (108)
商业管理思想的形成	厄尔·F·契特 (141)
公共政策分析和管理领域的回顾与前景	乔尔·弗莱什曼 (166)
地区研究在美国	理查德·兰姆伯特 (194)

美国的政治学：过去和现在

戴维·伊斯顿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欧文)

政治学的定义有许多种，诸如权力的研究、合法使用暴力的垄断权的研究、理想生活的研究、国家的研究，等等。如果有一件事情能区别西方的政治学的话，那就是政治学还没有就如何在最广泛的范围内描述它的研究对象达成一致意见。由于在别处已经详述过的理由，我决定把政治学看作是这样一种研究，它研究的是社会的决策是如何作出的以及如何被绝大多数人认为是在绝大部分时间内是具有约束力的。作为政治学家，我们要注意的是社会中具有下列性质的所有行动和体制：凡在或多或少程度上直接涉及如何作出权威决定、如何付诸实施以及可能产生的效果的行动和体制。这就是说，寻求对政治生活的理解就要致力于对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的研究。

实际上，这种描述可以适用于所有的政治系统，不管它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大型的还是小型的，工业化的还是农业化的，密集性的还是部落性的，等等。用这种方法来鉴别政治系统看来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里获得了许多政治学家的赞许。这样说多半是不会有错的。正是这样，使我们能够把我们的兴趣与经济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和其他各种社会科学家的兴趣区别开来。

带着这个政治研究的概念，让我们来看看 20 世纪的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政治学界所发生的一切。它经历了四个阶段，每个阶段各具特色。每个阶段都同前一个阶段相联系而又有了重大改进。我把这四个阶段称做：形式（法律）主义、传统主义（非形式主义或者前行为主义），行为主义和后行为主义。我将依次谈到每一个阶段。

形式主义和传统主义时期

在近代，19 世纪后期，政治学开始起步，当时的学者们坚信，一旦人们描述了在一个政治制度中决定着权力分配的那些法律，我们就算获得了关于政治机构如何运转的准确理解。政治学的研究者设想，在宪法和法律所规定的各种政治机构官员们的权利和特权与他们在岗位上的实际行动方式是配合很紧的。

19 世纪晚期，英国的瓦尔特·白哲特（Walter Bagehot），接着是美国的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当时他是一名学生，以后成为教授），有一个重大的发现。他们第一次发现，在政府部门和机构等正式组织周围，有各种非正式的行为和组织，决策制定权很可能存在于它们中间。白哲特、威尔逊和其他人在各个立法机构的非正式委员会和政党中发现了它们。后来的学者们把利益集团或者叫压力集团也列入了必须加以考虑的不断增多的非正式机构的单子里。

这些发现把政治学带入了一个新阶段。他们把注意力从形式的、法律的组织机构转向了发生在他们身边的非正式活动。这场发生在 19 世纪末叶的转折，在本世纪 20 年代全面展开。从本世纪 20 年代到 40 年代，在美国接受训练的人受到了富有特色的政治研究第二阶段即传统主义政治学的熏陶。在这个时期，教育训练把大量的注意力放在政党的运作和它们在国会中的作用，以及美国的压力集团和其他类型集团的发展上。后者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并被深入地加以分析，最初的工作是由当时不受重视的阿瑟·本特利（Arthur Bently）进行的。后来，这项工作为帕特里

顿·赫瑞 (Pendleton Herring) 和戴维·杜鲁门 (David Truman) 以新的方式所发展。

在方法论上, 传统主义时期把较大的注意力放在仅仅对政治过程的情报资料的收集和描述上, 而不是关于政治是如何运作的中心理论上。然而, 事实上, 一种潜在的理论在不声不响地指导着研究工作。尽管这时期大部分学者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可是实际上, 他们把政治过程看作是一部巨大的决策机械装置。他们其中的一个, 墨尔·费恩索德 (Merle Faensod) 认为决策是“力的平行四边形”的产物。他指出, 在决策的制定过程中, 不管在立法机关还是在行政部门的层次上, 它们都受到来自各种社会集团的巨大压力——政党的、官僚体系自身中的其它部分的、利益集团的、公共舆论的, 等等。这些压力互相作用, 呈现出一个力的平行四边形, 通过讨价还价、谈判、适应、妥协和调整 (通常用来描述这个过程的术语), 在某时某地将达到某一个平衡点。这个平衡点将产生一个特殊的政策, 或者把这个政策叫做作用在决策者身上的各种对抗性力量的平衡点。如果某一社会力量在某个时期由于某种原因发生了变化, 例如, 因为经济结构或社会观念的变化, 或者决策者易人, 那么, 就可能要求对旧的政策进行修改或者提出新的政策。各种社会集团因为对政策发生影响而产生的对抗将重新开始, 一个新的平衡点可能形成。正如我指出的, 在很大程度上, 这种平衡理论在著作中仅仅是潜在的。

传统主义时期这种独特的研究方法同它的理论基础一样是非形式主义的。没有多少专门的方法用来搜集资料或进行分析。方法, 即需要专门的注意力或技巧的领域不被看成是个问题。每个人都同样有资格收集和分析政治情报。结果, 没有正式的、或者严格的专门方法来检验所获得的资料已及在这些资料的基础上所作出的发现和解释的可靠程度。

而且, 常常难以区分研究者是在表述自己的偏爱, 还是在客观地描述机构的运作和人们在政治生活中的行为。对“应该是什么”

么”和“是什么”(“what should be” and “what is”)的陈述经常无法摆脱地纠缠在一起。事实和价值准则相互混杂成一团。

最后，我自己的研究生经历也反映出传统主义政治学缺乏理论上的一致性。在哈佛大学读研究生时，我选修了许多政治学领域的课程，它们包括政治思想史、市政或地方政治、宪法、对外政策、政府的工业法规、利益或压力集团、国际关系、外国政府、以及国会立法。在研究生毕业时，我的大脑一片混乱。从来没有人愿帮助我理解，除了与所谓的政府有松散的关系以外，为什么我对政治学的兴趣需要我接受这么广泛的、大量的学科内容的熏陶。我没有理由可以推断说政治学已经形成了一个连贯的知识总体。也没有一个理论框架，可以让我把这些课程放进去，或者用它来检验它们是否切题。

由于它的名称，政治理论原本可能是这样一个领域，我原本可能在它那里指望得到机会来研究政治理论。但理论竟证明只是基本上集中研究政治思想史的。当然，这种史学自身是有趣味的和重要的，但是它没有履行理论在比如说，经济学、化学或者物理学上的功能之一，即学科部分或全部的概念化。

在传统主义阶段，政治学发现了公共政策赖以形成的大量非正式活动。然而在这个时期，描述经常难以同价值准则相区别，理论尚未达到它的名称所赋有内涵，而方法又想当然地被认为是不成问题的。

行为主义时期

形式-法律主义和传统主义时期是近代政治学的最初的两个阶段。它们被美国政治学界的并迅速传播到世界其它地区的所谓的行为主义革命所取代。这个第三阶段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尽管在更早的时期已经有了萌芽。毫无疑问，这是本世纪发生在西方政治学界的最重要的转变。

尽管在英语术语当中，行为学说 (behaviorism) 与行为主义 (behavioralism) 有一个共同的词根，但是这两个词几乎没有

什么共同点，决不能混淆起来。政治学从来不是行为学说的（behavioristic），即使在行为主义的巅峰时期。行为学说是指一种关于人类行为的心理学理论，它是由 J·B·华生（Watson）所创立的。据我所知，还没有哪位政治学家赞成这个学说，确实，据我所知，甚至没有哪位政治学家，尽管可能有极个别的人，接受 B·F·斯金纳（Skinner）的心理学理论，他是“操作性条件反射”心理学派的创建者，华生的现代继承人。

在行为学说和行为主义之间，唯一真正的联系是它们都把着眼点放在人和人的行为上，把这看作是研究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的最恰当的资料来源。它们都认为自然科学的方法同样适用于对人类的研究。因此，除了把个体作为研究中心和接受科学的方法以外，两种思潮几乎没有什么相同之处。

政治学的行为主义有如下一些主要的特点，这使它有别于政治学研究的前两个阶段。

第一，行为主义认为在人的行为中存在着可以发现的各种一致性。第二，这些可以被经验主义的试验所证实。第三，行为主义对获取资料和分析的方法有更严格的要求。方法本身成为一个问题。它们不再是想当然的了。有关获取资料和分析资料的课程和书籍以前并不存在而现在成为家常便饭。量化，只要可能和似乎能行，就在学科中占了重要的地位。结果，在 50 年代和 60 年代，政治学变得善于运用大量的、并日益增多的复杂的经验主义的计量技术——问卷、访问、抽样、回归分析、因素分析、理性模型方法，等等。

第四，行为主义运动使自己在理论上比过去更多更多地注意精细化。对建立在客观观察基础上的系统知识的探索，使理论作为一个概念，在意义上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久远的过去，传统的看法认为理论在性质上是哲学式的，寻求理想生活的本质。在比较近的时期，理论基本上成了历史性的，试图解释和阐明过去若干世纪的政治思想出现的原因。而行为主义理论则是经验主义

的。它力图帮助我们解释，了解，可能的话，还要预测人们政治行为的方式和政治机构运作的方式。

这个时期，理论家们把相当大的精力用在各种分析层次的经验主义式的理论建设上。所谓的中程理论（middle range theory）企图建立关于本学科的大的方面的理论，象提出为民主系统提供理论的权力多元论，博弈论或公共选择理论。

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最广泛的特征的理论，称做一般理论（general theory）。这种类型的理论试图在最广泛的意义上提出对政治系统的认识。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和系统分析代表了这方面两种主要的理论尝试。

第五，许多行为主义者认为，研究者和社会的价值标准基本上可以被排除在探究过程之外。道德的评价和经验主义的解释被认为包含着两种不同的陈述，需要我们有分析地加以区分。行为主义采纳了原来实证主义者的假设（在本世纪早期由维也纳学派的实证主义者所提出），认为价值祛除（value-free）或者价值中立（value-neutral）研究是可能的。尽管我们当中的一些人，也包括我自己，并不赞成这个观点，然而在行为主义阶段的巅峰时期，它确实占有统治地位。其结果，道德的探究在重点考虑的有兴趣的事情中不再占有突出的地位。

第六，行为主义意味把新发现的重点放在基础或纯粹理论上而不是放在应用研究上。它假定社会科学家的任务是基本的理解和解释。它认为只有在获得了对政治机构如何运作和人们怎样进行政治行为的准确的理解之后，我们才可能有信心应用这些知识去解决紧迫的社会问题。因此，行为主义阶段促使学者们的兴趣从社会改革中转移出来，并鼓励他们把眼光放在作为研究向导的科学发展的需要上。

我们如何解释 50 年代和 60 年代发生在美国的行为主义革命呢？很明显，这是许多复杂的思潮的产物。它是学科自然发展的一部分。常识性的、众所周知的传统主义政治学，由于对历史的

描述和印象主义的分析的依赖，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不断发展的大规模的工业化社会，不可能用传统主义研究提供的关于不可靠性的解释来处理社会问题。在认识政治机构和政治过程中，大量的问题悬而未决。自然科学和其它的社会科学，比如心理学和经济学，运用更为严格的资料收集和分析的方法所取得的认识上的成就，也对政治学产生了很大影响。它们要求把政治分析从“普通的”（common）观念引向“科学的”（scientific）观念，用理论而不是社会标准来评价研究中的问题，用技术性的方法来取代纯粹的描述和常识方法。

此外，有些社会势力也促使在政治学的研究中采用科学的方法。在美国和苏联的关系处于冷战时期，尤其是朝鲜战争期间（1950-1953），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Mccarthy）在美国发起并领导了一个反对自由主义者和其他人的心理和法律上的恐怖统治时期。学者成为特别容易受攻击的对象。麦卡锡主义把社会改革的热情和批判性理论打入地下。

从这种背景来看，客观的、中立的或价值祛除的研究代表了学者们的一种戒备心境。这使他们避开公开的政治论战的危险而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智力上的合法的用武之地。这可能是一个在知识的发展过程中，由于不正常的原因而取得的无意中的收获的实例。当然，麦卡锡主义与作为一种新的政治学研究方式的行为主义的出现无关。它仅仅代表了一个把社会改革的热情打入地下的历史环境。这样，它把学者们引向政治上危险较小的基础研究领域。结果，基础研究对政治学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

除了麦卡锡主义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社会条件对行为主义的支持起了很大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繁荣，以及同它相联系的 50 年代和 60 年代初期的保守主义，导致了一种在美国非常流行的看法，认为意识形态的末日确实已经到了。经济的迅速增长给所有的人，甚至最穷的人，带来了物质上的好处。批判性社会思想，包括批判性自由主义本身，以及一切成为意识形态冲

突的东西，在美国全部消失了。一本著名的书，题名为《意识形态的末日》(The End of Ideology)，表达了这种信念。

回头来看，很清楚，意识形态并没有消失。它之所以似乎已经销声匿迹，只是因为当时的主流，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占有统治地位，暂时未受到挑战。不存在有力的斗争者。这种形势，当然，在60年代晚期由于黑人民权运动的兴起而发生了变化。但是在这个时期之前，相争的意识形态的确退缩了或者转入地下。由于现在的意识形态没有受到挑战，使得社会科学从作为研究内在标准的灵感的源泉的社会问题中走了出来，转而致力于社会科学自身发展的逻辑派生出来的社会理论的研究。这就给人以社会科学从社会退出而进入科学研究的象牙之塔的印象，至少如果有人从社会研究这个词的词面意义来说，会是这样。

很明显，从社会的观点看，这可能解释成社会科学家在逃避社会责任，而从科学的观点看，可以说是在社会的错综复杂中得到片刻的喘息。其结果使政治学得以在一个相对的没有受到干扰的气氛中致力于那些已经成为学科发展中心的技术方面——诸如社会研究中理论的地位，严格的研究方法的需求，获取和分析资料技术的精确手段，在政治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中建立专业化的标准，等等。简而言之，我们现在可以认识到，行为主义阶段是这样一个时期，出于不论什么样的历史原因和偶然的环境，社会科学正在致力于加强其研究的科学基础。所付出的代价是对社会批评和社会事物的关心的重大后退。

后行为主义时期

我所说的后行为主义革命——现在一般被用作下一个阶段的名称——开始于60年代并持续到今天。它表现了一种对行为主义的结果的深刻的不满，但并没有导致抛弃政治学中的科学方法，而是对科学性质的理解进行了实质性的修改。它是一场运动，至今仍在发展中。

为什么后行为主义会兴起？它的渊源是什么？

这场运动伴随着美国的所谓反文化革命而来。反文化革命在 60 年代末和 70 年代初兴起于西方，并波及到东方。它代表了一个世界范围的社会变革时期。全世界迅速增多的学院和大学产生大批的青年学生，运动的许多领导成员就来自他们中间。在美国，它最早起源于民权运动，特别是 1954—1955 年最高法院反对对黑人的教育隔离的裁决之后。同时还有黑人和其他少数民族改善生活条件的要求的增长和约翰逊和尼克松政府时期反对越南战争的广泛的抗议活动。最明显的是，它用新的态度对待服装的样式、性行为、社会上妇女和少数民族的地位、贫穷，关心物质环境（污染，原子废料，核能的危险）和社会的不平等。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后行为主义代表了现代世界对迅速而失去控制的工业化、种族和性别的歧视、世界性的贫困和核战争的危险的觉醒。

这里不必详细描述这运动了。我们所需要作的一切就是注意 60 和 70 年代的反文化革命对社会科学，特别是对政治学的影响。它对社会科学家提出疑问，为什么我们不能预见各种问题？以上提到的那些问题，在这个时期都已变得很突出。此外，即使社会科学预见到一些问题，那为什么对它们无所作为？这说明社会科学差不多已经退进了象牙之塔。这类问题导致了一场关于我们的学科的性质，以及它应该是什么的大规模辩论。

通过这些辩论，几件事情现在清楚了。在 50 和 60 年代行为主义阶段对科学的信奉，已经受到严重地怀疑。关于科学方法的一些批判反映了一个从 19 世纪继承下来的争论：人的行为由许多复杂的变量所组成，因此我们不见得能够发现任何类似法则的规律性；和原子不同，人类不是天定的，他们有自由意志，他们的行动即使在概率的基础上也不能被预言。虽然自然科学的方法已经表明取得了认识上的巨大成就，但这是因为他们对付的是无生命物质。可是原子没有情感或意图，而情感和意图，在本质上，是无法预言的或者难以观察或预测的。